从写实生活到写意舞台：歌舞剧《天边格桑花》的身体叙事与审美意蕴研究

贺青
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湖南 株洲 412007
DOI: 10.61369/SDME.2025310001

摘　　要： 歌舞剧《天边格桑花》作为新时代西藏现实主义题材文艺创作的代表作，成功地将玉麦乡守边英雄的真实事迹转化为具有深厚审美意蕴的舞台艺术。研究引入身体叙事理论，从舞蹈本体语汇的重构、角色情感的外化策略以及诗性审美的意境营造三个维度展开剖析。研究认为，舞剧并未局限于对艰苦守边生活的自然主义描摹，而是通过对西藏山南民间舞蹈素材的创造性转化，构建了具有地域辨识度与现代剧场性的身体语言系统；通过肢体动作在戏剧冲突中的张力呈现，实现了个体生命体验与宏大国家叙事的深层互构；通过核心意象“格桑花”的符号学运作与蒙太奇式的时空处理，完成了现实主义题材从“写实”向“写意”的诗性跨越。舞剧在保持民族风格与弘扬主流价值之间找到了美学平衡点，为当代民族歌舞剧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范本。

关 键 词： 歌舞剧《天边格桑花》；身体叙事；民族舞蹈语汇；现实主义题材；诗性表达

From Realistic Life to Impressionistic Stage: A Study on the Body Narrative and Aesthetic Implications of the Musical Drama "Gesang Flower at the Horizon"

He Qing
Zhuzhou Drama Heritage Center, Zhuzhou, Hunan 412007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realistic-themed artistic creation in Xizang in the new era, the musical drama "Gesang Flower at the Horizon" has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the true deeds of the border guards of Yumai Township into a stage art with profound aesthetic implications. The research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body narrative and conducts an analysis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ontological vocabulary of dance, the externalization strategy of character emotions, and the creation of poetic aesthetic artistic conception.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dance drama is not confined to a naturalistic depiction of the arduous life of border defense. Instead, through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folk dance materials from Shannan, Xizang, it has constructed a body language system with regional recognition and modern theatric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presentation of tension in dramatic conflicts through body movements, a deep mutual constru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s and the grand national narrative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semiotic operation of the core image "Gesang Flower" and the montage-style spatiotemporal treatment, the poetic leap of realistic themes from "realism" to "freehand brushwork" has been accomplished. Dance dramas have found an aesthetic balance between maintaining national styles and promoting mainstream values, providing an important model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ethnic dance dramas.

Keywords: The musical drama “Gesang Flower at the Horizon”; body narrative; vocabulary of ethnic dance; realistic theme; poetic expression

引言

近年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时代语境下，少数民族题材的舞台艺术创作迎来了新的高峰。作为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倾力打造的重点剧目，歌舞剧《天边格桑花》自2022年首演以来，便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的艺术呈现引发了广泛关注。该剧取材于西藏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的真实历史事件，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卓嘎、央宗姐妹及其父亲桑杰曲巴为原型，讲述了一家三口在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长达几十年的岁月中，以放牧抵边、以身许国，在“三人乡”默默守护祖国神圣领土的感人故事。作为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及获得第十七届“文华大奖”提名的优秀作品，[1]《天边格桑花》不仅是新时代西藏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更是中国民族歌舞剧在现实主义题材创作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它不仅承载着讲述“中国故事”、弘扬“老西藏精神”的政治使命，更在艺术本体上展现出藏族传统歌舞向现代剧场艺术转型的独特魅力。

然而，将玉麦乡的守边故事搬上歌舞剧舞台，面临着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概念与形象”转化的难题。守边生活在本质上是枯燥、重复且充满了极度艰辛的，这种“静态”的坚守与歌舞艺术所追求的“动态”表现力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张力。如何避免将英雄人物脸谱化？如何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具有审美感染力的艺术话语？如何在保留浓郁藏族风格的同时，使作品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期待？这些都是创作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以往的红色题材创作，往往容易陷入“重叙事、轻本体”的窠臼，而《天边格桑花》的突破之处在于，它并未停留在对故事情节的简单复述，而是充分发挥“歌舞剧”这一综合艺术形式的优势，试图通过身体语言的诗性表达，去重构那段关于孤独与信仰的生命记忆。

目前关于《天边格桑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维度：一是对剧目叙事结构与角色塑造的分析，探讨其“以小见大”的家国叙事策略；二是对剧中音乐创作的民族性与交响化融合的探讨；三是从宏观的美学视角，分析其具身化审美构建与文化传播价值。这些研究为理解该剧的艺术成就提供了宝贵视角，但大多侧重于文学剧本或整体风格的宏观评述，相对缺乏从“身体叙事”这一微观视角出发，对剧中舞蹈语汇的动作形态、编创逻辑及表意机制进行的深入剖析。歌舞剧的核心在于“舞”，在于演员身体在特定时空中的在场与表达。剧中的舞蹈动作并非简单的插科打诨，而是承载剧情推进与情感外化的核心媒介。

综上，研究拟引入“身体叙事”的相关理论，聚焦于歌舞剧《天边格桑花》中的舞蹈本体。研究将考察剧中对西藏山南地区民间舞蹈素材的舞台化重构，分析其如何从生活形态转化为艺术形态；进而探讨这种特定的身体语言如何在戏剧冲突中完成角色情感的外化与性格塑造；最后阐释该剧如何通过“格桑花”等意象的符号化运作，实现从现实主义的“苦难叙事”向浪漫主义的“诗性表达”的审美升华。通过对该剧身体叙事策略与审美意蕴的系统梳理，旨在揭示新时代民族歌舞剧如何在坚守传统与开拓创新之间找到平衡，为今后的现实主义题材舞台创作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一、民族民间舞蹈语汇的舞台化重构

舞蹈语汇作为歌舞剧叙事的物质载体，是构建剧目地域风格与文化身份的核心要素，更是链接现实生活与舞台艺术的桥梁。《天边格桑花》的故事发生地——西藏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具一格的藏族民间舞蹈文化。舞剧在创作过程中，并未简单地对原生态舞蹈进行“自然主义”式的搬运或展示，而是基于现代剧场艺术的叙事需求与审美规范，对山南地区的民间舞蹈素材进行了深度的提取、解构与重组。这种从“自娱性”广场艺术向“他娱性”剧场艺术的转化，使得传统的民间舞段在保留浓郁地域基因的同时，具备了更为丰富的表意功能与戏剧张力。

西藏山南素有“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2]的美誉，拥有极为丰富的舞蹈资源，剧作精准地抓取了具有鲜明地域辨识度的“果谐”、“谐钦”等民间舞蹈形式，将其作为构建全剧舞蹈语汇的基石。广泛流传于当地的“果谐”，在传统的民间语境中强调群众的参与性和娱乐性，往往呈现为封闭的圆圈队形。为了适应镜框式舞台的观演关系，编导打破了这种封闭性，将传统的“围圈而舞”解构为线形、块状或散点式的舞台调度。在表现玉麦乡群众节日庆典或集体欢聚的场面时，演员们虽然保留了果谐中典型的顿地、甩袖等动律，但身体朝向从“向心”转变为“向众”，这种空间关系的转换将原本内部的情感交流场域彻底打开，使观众得以直观地感受到藏族人民热情奔放的生命力。与此同时，为了契合剧中某些庄重肃穆的戏剧氛围，编导还巧妙融入了风格更为典雅沉稳的“谐钦”元素，通过对呼吸控制与肢体延伸感的强化，营造出一种崇高的审美意蕴。

如果说特定的民间舞种确立了剧目的风格基调，那么对生产生活动作的舞蹈化提炼，则赋予了该剧浓厚的生活质感与现实主义底色。玉麦乡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独特的生存方式，放牧、巡边、修房等劳动场景构成了剧中不可或缺的叙事环节。剧作成功运用了“模拟与表现相结合”的手法，将原本枯燥、重复的劳动动作升华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舞蹈语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打阿嘎”这一元素的创造性运用。“打阿嘎”本是藏族修筑屋顶时的劳动歌舞，在剧中，这一元素被转化为表现一家三口建设家园、扎根边陲的核心语汇。编导保留了打阿嘎核心的“夯击”动律，但在节奏处理上进行了交响化的变奏——由最初建设新居时的欢快整齐，逐渐过渡到应对暴风雪时的沉重艰难。此时，手中的夯杆不再仅仅是劳动工具，更成为了人物在恶劣自然环境中支撑身体、对抗风雪的支点，实现了物与人的高度融合。

在日常生活动作之外，剧作还进一步挖掘了动作背后的精神维度，通过对仪式性动作的艺术升格，构建起超越物理空间的意义世界。在藏族文化中，仪式往往是连接人与神、人与自然的重要媒介，而《天边格桑花》则将这种仪式感投射到了政治伦理的表达中。剧中关于“升挂国旗”与“描红界碑”的处理，极具震撼力。编导将桑杰曲巴整理国旗、挥臂展旗、抬头凝视的一系列动作链条进行了放慢、定格与反复强调，剥离了日常动作的随意性，注入了类似于宗教朝圣般的虔诚感。这种被“神圣化”的身体语言，配合着高原特有的行走体态——重心下沉、身体前倾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以对抗风阻，共同塑造了一种坚如磐石的雕塑感。通过这些经过高度提炼的仪式性动作，剧中人物将对“小家”的眷恋上升为对“大国”的信仰，使得观众在视觉的震撼中，潜移默化地完成了对剧作主旨的情感认同。

二、角色情感外化与身体叙事策略

如果说民族民间舞蹈语汇的重构为全剧奠定了形式基础，那么身体语言在戏剧冲突中的具体运用，则是《天边格桑花》实现叙事深度与情感共鸣的关键所在。在歌舞剧的舞台上，言语往往是辅助性的，身体才是叙事的主体。该剧巧妙地利用肢体动作的张力、幅度和质感变化，将剧中人物在极端环境下的内心挣扎、代际冲突以及最终的信仰确立，进行了细腻而深刻的外化呈现。

在构建戏剧冲突的维度上，编导并未依赖大量的台词对白，而是通过双人舞及多人舞的调度关系，直观地视觉化了“去”与“留”这一核心矛盾。剧中，父亲桑杰曲巴作为守边精神的坚定践行者，其身体语言往往呈现出一种向下扎根的稳固态势，动作沉稳有力，犹如玉麦的一棵老树；而早期的卓嘎和央宗姐妹，面对外面世界的诱惑与现实环境的恶劣，其肢体语言则更多表现为向外的张望与不安的躁动。在父女发生争执的关键舞段中，这种心理层面的对抗被转化为物理层面的肢体拉锯：父亲试图用粗糙的双手将女儿拉回这片土地，而女儿则试图挣脱父亲的怀抱冲向远方。这种肢体的接触、对抗、分离与再聚合，不仅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更生动地隐喻了爱国信仰传承过程中的艰难与磨合，使观众在“动觉共鸣”中深刻体会到守边抉择背后的情感重量。

当戏剧的焦点从人际冲突转向人物内心时，独舞段落便成为了挖掘角色深层心理的有效手段。剧作在展现卓嘎、央宗姐妹的成长历程时，安排了多段极具表现力的独舞。在这些段落中，舞台时空仿佛凝固，演员通过身体的折叠、蜷缩与极度的延展，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青春生命在与孤独、严寒对抗时的内心独白。例如，在表现漫长冬夜的守望时，演员运用了大量地面动作，身体紧贴冰冷的舞台，仿佛在与这片冻土进行无声的对话；而当这种压抑积累到顶点时，又通过一系列快速的旋转与跳跃完成情绪的宣泄与爆发。这种由内而外的身体律动，成功地将人物内心的孤独感具象化，同时也预示着她们在磨砺中逐渐生长出的坚韧品格，完成了从普通牧民少女向“格桑花”式英雄人物的心理转变。

不仅是主要角色，群舞场面在该剧的身体叙事中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超越了传统的伴舞功能，实现了人与环境的具身互动。在表现玉麦乡恶劣自然环境的段落里，群舞演员通过身体的堆叠、起伏与冲撞，构建出“暴风雪”、“泥石流”等极具压迫感的视觉意象。此时，主角在群舞构成的“人墙”或“风暴”中艰难穿行、跌倒又爬起，这种个体身体与群体身体之间的对抗关系，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在极端自然面前的渺小与伟大。群舞在这里既是客观环境的再现，也是主角精神困境的外化投射，通过这种宏大与微小并置的叙事策略，剧作成功烘托出守边英雄在绝境中不屈的生命意志，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悲剧力量与崇高美感。

三、现实主义题材的诗性审美表达

在现实主义题材的歌舞剧创作中，往往存在着“真实性”与“艺术性”难以兼顾的矛盾，过于写实容易陷入生活流的琐碎与枯燥，而过度的艺术渲染又可能削弱题材本身的严肃性与历史厚度。《天边格桑花》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时代红色文艺的佳作，在于其超越了对苦难与艰辛的自然主义描摹，转而通过核心意象的营造、时空结构的蒙太奇处理以及虚实相生的意境构建，成功地将一段原本粗砺的守边生活转化为了一首荡气回肠的舞台诗篇，实现了从“生活真实”向“审美真实”的诗性跨越。

诗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抽象审美的物化表现，这种诗的具身性会在戏剧中映射为氛围、色调以及各种物象的人性隐喻。[3] 剧作最显著的审美特征在于对核心意象——“格桑花”的符号学运作。在藏族文化语境中，格桑花象征着幸福与顽强的生命力，而在本剧中，它被赋予了多重表意功能，成为了连接剧情、人物与主题的精神图腾。在视觉呈现上，格桑花不仅是具体的舞台道具，更被外化为演员的肢体造型与服装色彩。“雪”在诗性表达中往往被赋予纯洁、神圣的意蕴，西藏作为雪域之地，雪则更加成了人与天（自然）对话的重要桥梁，在孤楚、坚韧的人类通感中也透露出藏人“家”的归宿。[4] 当舞台上漫天的风雪（白色）与鲜艳的藏族服饰及手中的花朵（红色 / 彩色）形成强烈对比时，这种色彩上的视觉冲击力消解了恶劣环境带来的压抑感，将残酷的生存现实审美化。更深层面上，格桑花成为了卓嘎、央宗姐妹的精神互文。剧作并未直接展现她们日复一日的枯燥巡逻，而是通过舞蹈编排，将她们在雪线上的行走、伫立与守望，隐喻为格桑花在寒风中的摇曳、扎根与绽放。这种借物喻人的修辞策略，为原本坚硬、厚重的爱国主义题材包裹上了一层柔性、浪漫的审美外衣，使得观众在欣赏“花”的形态美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体悟到人物内心那份坚韧不拔的高贵品格。

除了意象的诗性营造，剧作在叙事时空的建构上同样突破了线性时间的束缚，运用了类电影化的“蒙太奇”手法，[5] 极大地拓展了舞台的心理空间。几十年的守边岁月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平铺直叙，极易陷入流水账式的冗长，因此，编导巧妙地采用了倒叙与插叙相结合的结构策略。大幕拉开，老年的卓嘎与央宗伫立在玉麦的土地上，随着她们的回忆，舞台时空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自由跳跃。这种非线性的时空拼贴，不仅有效地规避了对漫长岁月的繁琐交代，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种“心理时空”。在这种时空中，父亲桑杰曲巴的形象可以跨越生死的界限，与成年的女儿们在精神世界中重逢与共舞。这种超越物理时间的艺术处理，使得“守边”这一行为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过程，而被凝练为一种永恒的精神状态，让观众在时空的交错中，更深刻地触摸到人物情感的浓度与厚度。

在具体的舞台呈现中，这种诗性表达最终落实为一种“虚实相生”的意境营造。剧作在舞美设计上并未追求对玉麦乡地理环境的极度仿真，而是采用了写意为主、写实为辅的美学原则。[6] 舞台上，巨大的雪山背景往往以抽象的线条或投影呈现，营造出一种空灵而辽远的氛围；而前景中的牛粪火塘、飘扬的五星红旗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以及那块刻着“中国”二字的界碑，则作为写实的支点，锚定了故事的真实质感。这种“虚”的环境氛围与“实”的道具细节相互映衬，构建出了一个既具现实压迫感又具精神崇高感的艺术空间。特别是当全剧推向高潮，舞台灯光将风雪隐去，只留下一束追光打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与盛开的格桑花上时，现实中的苦寒被彻底剥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辉。这种由景入情、情景交融的意境处理，成功地将原本属于地理概念的“边境”，升华为属于精神范畴的“家园”，完成了现实主义题材在美学层面上的最终突围。

四、结语

歌舞剧《天边格桑花》作为新时代西藏文艺创作的重要成果，其价值不仅在于成功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守边故事，更在于它为现实主义题材尤其是红色题材的舞台艺术转化，提供了一个极具示范意义的美学范本。该剧的成功实践有力地证明，宏大的国家叙事与个体的生命体验并非不可调和，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种恰当的艺术语汇，将概念化的“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身体”。

回顾全剧，主创团队通过对西藏山南民间舞蹈语汇的深度挖掘与创造性重构，剧作建立了一套既有地缘特色又具现代审美的身体语言系统；通过对角色内心世界的细腻外化与蒙太奇式的时空拼贴，剧作突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刻板，赋予了枯燥守边生活以深邃的诗性光辉。这种从“生活之真”向“艺术之美”的跨越，使得作品摆脱了单纯的说教色彩，让观众在审美愉悦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对家国情怀的心理认同。《天边格桑花》的探索对于当下民族歌舞剧的创作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在讲述“中国故事”、弘扬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唯有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基因，并以现代剧场艺术的规律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创作出既有高原厚度又有艺术高度的精品力作。在此意义上，《天边格桑花》不仅是一曲关于玉麦乡守边英雄的生命赞歌，更是一次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身化书写，其在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之间所达成的美学平衡，必将为今后的民族艺术创作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欧建平 . 深植于 " 国 " 中的 " 玉 " 麦情——评西藏自治区歌舞团歌舞剧《天边格桑花》[J]. 舞蹈 ,2024,(06):58-65.
[2] 罗雄文 . 西藏山南市文旅融合发展的策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视角 [J]. 党政干部论坛 ,2025,(03):43-45.
[3] 王雪松 , 廖洪刚 . 红色藏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的具身化审美构建 [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2023,(01):174-182.
[4] 尹明钰 . 天边守国境丹心蕴浓情聚焦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原创歌舞剧《天边格桑花》[J]. 中国戏剧 ,2025,(01):60-61.
[5] 喻婷婷 . 角色塑造与叙事表达：歌舞剧《天边格桑花》的艺术特色 [J]. 明日风尚 ,2025,(02):7-9.
[6] 陈艳 . 爱与美的赞歌：歌剧《边城》的 " 诗画 " 美学 [J]. 戏剧文学 ,2024,(01):104-108.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